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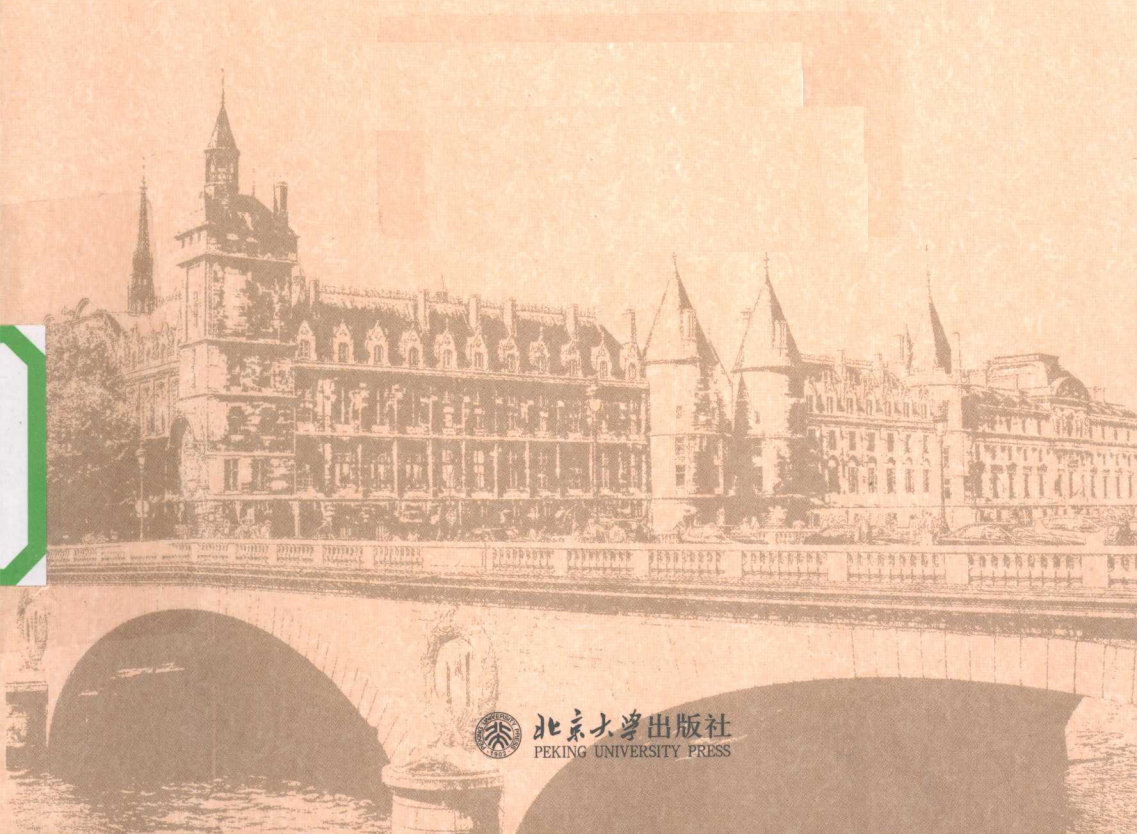
跨越边界： 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



Crossing the Border: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张旭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rossing the Border: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

张 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张旭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6751-9

I. 跨… II. 张… III. ①比较文学—研究②文学—翻译—研究
IV. I0-03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1838 号

书 名: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 旭 著

责任编辑: 叶 丹 · 张 冰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751-9/I · 22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299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学科旅行与翻译

单德兴

“比较文学”此一观念的源起,论者往往追溯到德国大文豪歌德于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的发展主要依循两个路线:一个着重于以实证、历时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为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ies),被称作法国学派(French School);另一个着重于以平行、共时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似,是为模拟研究(analogy studies),被称作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两者的重点与手法不同,各自吸引了众多学者,是比较文学中公认的两个重要学派。

至于翻译更是由来已久,可说自从人类与异族、他者接触以来就有翻译。古今中外也不乏关于翻译的论述。1970年代以后,由于学者的大力提倡、努力经营而卓然有成,使得相关研究成为当今的显学,遂有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translatology)之称。尽管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背景不一,然而原先便拥有数种语言能力的比较文学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张汉良在台湾的《中外文学》发表《比较文学专栏前言》一文,有意“对比较文学涉及的课题,作系统性的介绍”,以期克服“中西文学比较的特殊难题,乃至望文生义的现象”。这些课题包括:“(一)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向与范畴;(二)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三)文学史、文学断代与文学运动;(四)影响研究;(五)模拟研究;(六)文学研究;(七)主题学研究;(八)比较文学与思想史;(九)文学与相关艺术;(十)文学与其它学科;(十一)翻译问题;(十二)比较文学与口述传统等。”^①此分类涵括了比较文学的重要议题,相当具有代表性,而“翻译问题”为比较文学的合法议题殆无疑义。

张汉良撰写该文距今正好三十年,当时正值比较文学在台湾萌芽、

① 张汉良:《比较文学专栏前言》,《中外文学》1978年第6卷第10期,第91页。

发展的阶段,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氛围,而国际上此一学科也是一片形势大好。然而,随着学术典范的转移,尤其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兴起,原先范围广泛、方法灵巧的比较文学,却仿佛遭到国家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夹击,面临了空前未有的窘境与危机,纷纷传出告急之声,而且发声的不乏此一学科中的健将。如本书中提到,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于1993年所著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指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这三方面所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学科,并将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范围”^①。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于2003年出版的《一个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更是直接宣告了此一学科的死亡。我们固然赞成巴斯奈特“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这三方面所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之说,也同意翻译研究赓赓然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原本就涉及跨语言、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在此全球化的时代是否已经过时、甚至死亡,仍然有待深入观察、仔细思辨。^②

因此,此时此地出版张旭博士的《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自有深意。此书的副标题与上述巴斯奈特的第七章同名,固然标示了本书的内容与结构,却试图从一位中国学者的角度来面对并响应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其实,不论是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其中任何一门都错综复杂、经纬万端,更何况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本书则以简驭繁,指出两者的共通性在于“跨越边界”,并从现代跨越性

①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161. 不仅如此,她更提到“今天,比较文学就某个意义来说已死”(“Toda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in one sense dead,” p. 47)。

② 如沈安德在《东西比较文学何去何从? 晚近来自美国的两个答案》(James St. André. “Whither East-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wo Recent Answers from the U. S.”)一文中便指出,“如果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不能成功地响应欧美体系以外的文学所提出的挑战,那么这门学科其实就会像巴斯奈特所主张的那样将会死亡。因此,如何进行东西研究是整个领域的关键性问题。”(“I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does not successfully answer the challenge posed to it by literatures outside of the Euro-American system... then the discipline will, in fact, as Susan Bassnett argues, di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proceed in East-West studies is thus a vital one for the entire field.”)《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2003年第22期,第302页。

的视角切入。全书的架构也印证了副标题“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前五章集中于比较文学的相关议题，以第六章“交叉的可能：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为转折，后八章集中于翻译研究的相关议题。其中有宏观的讨论与观察，也有个案的钻研与探究：前者如当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建设，意识形态批评与诗歌翻译研究等；后者如米勒(J. Hillis Miller)的文学观与翻译观，沈宝基的诗艺活动，胡适的译诗与创作，朱湘的译诗美学等。大抵而言，各文都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出发，针对现有的数据、文本与现象加以解读与剖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也试图展示可能的解决之道。

作者于中国从事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多年，并取得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先前便曾与人合编《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2003)，并独力撰写《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2008)，不但娴熟于当前的文学、文化与翻译理论，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力更为识者所称道。因此，本书的特色在于宏阔的视野，稳健的观点，问题的掌握，文献的钻研，高度的反思，以及对译诗的深入研究，展现作者以“古今东西”为坐标，寻求中西知识与文化的汇通之努力，其中举出一些外来值得借镜、攻错之处，以及若干反省或爱深责切之语，尤其值得深思。

萨义德在《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中曾经提到，理论或观念由一地旅行、流传到另一地时经常出现的模式：最先是源点(point of origin)，也就是观念产生或进入论述的起始环境；其次是观念由源点到另一时空所经过的距离；第三是面对移植的理论或观念的一套新条件(可能是接受或抗拒)；第四是在新的时空中，观念被新的使用者所转形。^①米勒在《理论之翻译》(“Translating Theory”)一文中进一步发挥，强调理论由一地旅行、翻译到另一地时，因为不同的时空与文化条件所产生的新效应，并且乐观其成。^②

理论的旅行与翻译固然如此，学科的旅行与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比较文学在海峡两岸的发展便是明显的例子。本书对于中国大陆将比较文学设于中文系引发的一些现象有所反思与建议(包括加强外语能力

①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3, pp. 226—227.

② J. Hillis Miller.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 in *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Taipei: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1993. pp. 1—26.

的掌握)。在笔者看来,台湾的比较文学之发展,由早先外文系与中文系通力合作,到现今以外文系(尤其是英文系)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也多追随晚近欧美流行的文学与文化理论,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小题大做式”的深度探讨,固然多年来也有相当具体的研究成果,但在内容和方法上与英美文学、文化研究相近,逐渐欠缺区隔与特色,也有值得反省之处。近来两岸比较文学学者交流日益频繁,当有利于重新省思此一学科的流传与发展。

“文学已死”之说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但蓬勃的文学创作对此一说提出了最强有力的反驳。至于比较文学是否已过时,甚至已死,就看此学科的学者如何面对质疑与挑战。徒守旧思维、旧做法,高呼建立学派,并无补于当前的危机。若能以更宽阔的视野、扎实的学养、稳健的方法、深入的研究、具体的成果为学门注入新血,就有希望化危机为转机,使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继续跨越边界,再创佳绩,“其命维新”。

2008年9月3日

台北南港

前 言

从现代跨越性视角对“比较文学”与“翻译”加以本体透视,发现二者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简约地看,“比较文学”中既要有“文学”,也要有“比较”,然而“文学”与“比较”简单地相加并非就是“比较文学”,它们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格式塔关系,亦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叠加。比较文学,顾名思义,是要就异质体系内的文学作品及其现象展开比较研究,其比较的目的、对象与内容可能很不相同,彼此间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可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从事跨越边界的活动。与此紧密相连的则是翻译研究。尽管有关翻译的定义成千上万,不过从实质上讲,“翻译涉及文字—文本—文学—文化等不同层面,也是跨语言、跨国度、跨文化、跨时空的产物”^①。换言之,翻译首先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行为,同时还是文化层、精神层的多重转换行为,它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边界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关涉文学或文化性质的翻译活动,使翻译与比较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

比较文学的概念最初源于德国大文豪歌德(1823),但他当年并未直接使用过“比较文学”这一名称,他使用的只是“世界诗学”(Weltpoesie)与“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等几个术语。这些术语主要适用于如下三方面:一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之间所有的协调形式;二是所有旨在获取知识、实现相互间理解与容忍以及热爱别的民族文学的手段;三是关注本民族文学的外来接受问题。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乃是各国文学交通线上的“共同市场”,那里陈列的品种琳琅满目,有翻译、评论、偏重于外国文学的刊物、本国作品外来的接受及其介绍,还有书信、旅游、会议和各种团体等形式。^② 回顾历史,就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之际,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如日中天。在这场运动的声浪中,既有对各

① 单德兴:《翻译与脉络》,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237页。

② Hans-Joachim Schilz & Philip H. Rhei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Early Years: An Anthology of Essay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p. 3.

民族文化大交融的渴望，又有对文学的民族根源进行追溯的诉求。正是那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背景，促使歌德特别重视国际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珍视所有重要作品中带有普世性的东西，还有那些产生国际影响的作品。正因为浪漫主义思潮风行于当时的欧洲，比较文学在 19 世纪初叶才得以迅速地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那里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拉开了距离，同时在浪漫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欧洲中心主义的势头也愈发强劲。尽管此间一些有关东方的主题反复出现在欧洲人的笔下，但那多是作为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欧洲人猎奇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由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即后来所说的“比较文学”，自然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这又为日后引来第三世界国家众学者的批评埋下了伏笔。^①

自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在他们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首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到 1886 年波斯奈特在他的专著《比较文学》中系统地论述“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很长时期内，欧洲的比较文学始终沿着实证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向发展。从方法上讲，实证学派重在事实联系的考证、考据，也就是通过收集可靠的材料来考察各国文学间在题材、主题、典型、思想等方面的假借、接受和影响，从而找出不同国家文学间的事实联系。^② 它更多关注的是“文学关系”，而不是“文学比较”；影响研究传统上比较注重外在的关系梳理，后来也转而关注影响联系的内部肌理。中肯地说，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影响研究，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所有的研究都要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问题自然就浮现了出来。尤其是那种机械地探寻源头和影响的做法，后来更是被视作比较文学出现危机的症状之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有所改观。1958 年，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这篇论文的宣读为标志，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正式宣告诞生。所谓“平行研究”，就是研究那些没有直接联系，但在文学的发展、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可以相互比较的文学现象，通过对不同国家文学的评价与阐释，

① 这种批评最典型的见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在该书中作者猛烈地批判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在认识论上建构起了某种等级体系，其中欧洲及其拉丁—基督教文学处于中心和顶端的位置”。参见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3, p. 6.

② 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 142 页。

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美学价值。^①可以说,随着平行研究方法在美洲大陆以及其他各地的风行,促成了平行研究学派足以与欧洲的影响研究学派相抗衡的格局。正是在这种对抗声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后,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走进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众多的学者加入到此行列中,更是将这一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就在比较文学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不少学者开始批评比较文学表现出泛化或称无边化的趋势,于是不少人开始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众人的眼中,就像当年韦勒克等人描绘的那样:比较文学没有独立的研究方法,现行的研究手段绝大部分只是从相关学科中借鉴而来,^②另则众人对其研究对象也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特别是大家感觉到其比较的对象所具有的文学性关怀越来越少,从而在研究者那里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目标认同危机。^③非常有趣的是,伴随着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的认识显得愈发模糊。这样学界就再度盛行起早年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论调。

到了世纪之交,比较文学界的危机论调愈演愈烈,尤其在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和青年学者中更是如此。这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工作者无所适从,抑或可以无所事事呢?其实不然,比较文学界出现了危机,最主要的是由于研究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危机,也就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就其研究对象达成某种共识。既然目前的研究者还都有各自的事业可干,而且众多的学者还尝试将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或是尝试对一些传统的课题运用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然后在现代跨越性视野中进行观照,这样自然诞生了一批相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均表明比较文学还远未走向衰亡,相反它仍有着强劲的生命力。正如在西方语言中,“end(s)”一词的古意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它既表示“目的”,也表示“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对比较文学的衰亡问题换一种审视方法,也就是要认识到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那旧有的机体已宣告死亡,但比较文学自身仍然具有

① 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第211页。

②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90.

③ André Lefevere. *Literary Knowledge: A Polemical and Programmatic Essay on Its Mature, Growth, Relevance and Transmission*. Assen: Van Gorcum, 1977, p. 6.

强劲的生命。只要研究者能够端正认识,更新方法,只要他们能够选准新的视点,就可以在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内继续有所作为。

这种能够使比较文学学者取得突破的领域之一便是翻译研究。鉴于众学者普遍意识到比较文学学科内部存在着危机,为了寻求新的学术出路,众多的学人便开始将研究兴趣延伸至其他学科,从而促成了交叉研究的迅速发展。交叉研究又称跨学科研究,它的主要做法是将适合于某领域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运用于别的领域,其哲学根源在于事物间存在着某种普遍联系,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范式间具有某种局部的可通约性。正是由于比较文学与翻译同时具有跨越性特征,这种跨越行为通常是在跨语言、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等维度中进行,这就使得各自的研究领域发生转型成为可能。历史的事实又表明:在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在欧洲各国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一批比较文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到翻译研究领域,他们随即推出一批相当厚重的作品,进而推动了西方翻译研究的飞速发展。到了世纪之交,这种发展势头愈演愈烈,以至像巴斯奈特这样的比较文学界著名学者都振臂高呼,喊出了比较文学研究必须让位于翻译研究的口号。尽管其提法仍值得商榷,此说却多少反映出当今比较文学界的一大走势,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客观地说,比较文学领域发生的若干转向,尤其是朝着翻译研究转向,有其内在的根源。这一则是由比较文学自身出现的若干问题引起的,另则缘于翻译所具有的跨越性特征。如果从词源来考察,在古希腊语中,“翻译”意即跨越,它强调的是空间的面向和越界的活动。无独有偶,希腊语中的“metaphor”(隐喻)一词最早也有“带过”的意思。这也决定了翻译的最初定义必然会带有隐喻性,翻译无非是某一原作在别的语言中一种广义的隐喻式对等。同样在德语中,几个表示“翻译”的语汇,如“übertragung”、“übersetzung”都有“带过”、“重新放置”等含义,它意味着一种语言所写下的东西一经挑选,随即被运送并安置在别的地方。用隐喻式或修辞性语汇来表述,就是要跨越边界。翻译实则包含了一个被运载并跨越语言与语言、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界线的过程。任何作品一经翻译,实则经历了一个换位、运送和跨越的过程。^①本来比较文学最核心的标志就是要从事一种跨越边界的活动,这种跨越性活动

^① J. Hillis Miller,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ng theory”, in *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pp. 3—26.

又分别是在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等维度中进行。巧合的是，翻译又最能体现上述这些特质，这也使有关它的研究与比较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

近年来，学术界十分盛行“转向”和“转型”等说法，这似乎意味着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开始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不时地又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况，如果再一味地固守往常的做法，势必会将其研究引向死胡同。这就促使众多研究者对既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等进行重新的调整，由此表现出种种有异于往常的所谓“转向”或“转型”的做法。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研究者为了个人的学术生存而表征出的“与时俱进”的举措；从更深层来着眼，这正是研究范式的三个维度，即自然观、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不断地运作使然。^①一言以蔽之，这也是研究者奉行“穷则变，变则通”的生命法则而做出的必然抉择。

本书大致记录了作者过去十余年的学术历程。在过去的为学生涯中，本人始终坚信真正的人文研究，至少要有双重维度的关怀：一是要有历史维度的关怀，二是要有东西维度的观照，二者结合最佳的切入领域便是翻译研究。近年来，本人的学术成长道路可以说是几经曲折，先是主修语言学方面的课程，后来从事语言学和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接着又弄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西文艺美学批评，然后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最后又转到翻译研究。从浅表层来看，上述这种不断的转向似乎表明本人的思想十分易变，或者说我喜欢脚踏两条船或多条船；如果从更高处着眼，这似乎又表明我们研究者生命中缺少某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而我又十分清楚，自己的这种转向有工作上的需要，有个人学术兴趣方面的因素，更多地还是为了顺应世界学术潮流的发展而及时做出学术方向的调整。况且自己过去所从事的翻译研究也多是结合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理论展开和进行的。之所以能够这样结合不同的学科开展学术研究，是因为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借用托玛斯·库恩(1962)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这些学术范式彼此间具有某种“局部的可通约性”，尤其在那种形而上的层面更是如此。有趣的是，自己的这些研究在许多时候不觉间也带有了浓厚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

^① “范式”(paradigm)是本书沿用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有关它的讨论可参见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另则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有这样的发现:本书作者始终是从现代跨越性的角度,在“上下古今”的坐标系中,参照东西方的知识谱系特征,努力寻求中西学理问题在文史哲方面的打通。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多已在海内外一些杂志或学刊上发表,部分内容则系首次出现。即便是已发表过的文章,此次付梓均做了重大的修订。诚如众多后现代批评家所言:当一部作品发表后,作者的使命便宣告完成,此后他(她)便进入“退场”的状态,于是就有了“作者死了”的说法。接下的任务则落到了读者的肩上,也就是由他们来对这些文本加以阅读和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种种阐释。鉴于所有的阅读和理解都有赖于某种前理解,这就意味着这种阅读永远不会完结。于是在那种文本召唤机制的运作下,人们不断地对这些文本加以重新阅读和阐释,而且他们在每次阅读中又能获得某种新的理解和认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一方面认同这种后现代的阅读观,同时承认自己也是这一文本的某位特殊的读者,由于这些文本产生时面对的读者和生成的背景有所差异,现在读来感觉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难免有疏忽之处,这更加促使作者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全方位地“重写”,努力去掉种种陈旧感,给读者以全新的面貌,让人从中获得启迪。

目 录

第一章 学科的反思：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
第一节 “比较文学危机论”及其反思	(1)
第二节 “特色主义命题”及其反思	(6)
第三节 “比较文学从属说”及其反思	(9)
第四节 翻译研究与译介学之争及其反思	(11)
第五节 前景与展望：未来发展蓝图	(15)
第二章 借鉴的起点：香港比较文学教学之管窥	(19)
第一节 现代西洋的学科建制与中西兼顾的课程	(20)
第二节 紧跟时代的教学与特色分明的授课	(25)
第三节 现存问题与未来展望	(33)
第三章 建构的设想：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的若干建议	(37)
第一节 坐标系的观照与文献学的训练	(38)
第二节 知识的定位与学科的打通	(43)
第三节 阅读视野的拓展与比较方法的更新	(51)
第四章 观念的更新：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米勒的文学观	(56)
第一节 从文学的终结到作为虚拟现实的文学	(56)
第二节 文学的秘密与文学阅读的缘由	(60)
第三节 阅读的方法与比较阅读	(64)
第四节 观念“反思”后的再反思	(67)
第五章 视界的融合：象征派诗人沈宝基的诗艺活动寻踪	(71)
第一节 幽暗间的游梦：沈宝基早年的诗艺天地	(72)
第二节 故国里的寻宝：沈宝基西游后的诗艺活动	(77)
第三节 沉舟中的梦游：沈宝基晚年的诗艺成就	(85)
第四节 一场幻觉的记录：未完的结语	(92)
第六章 交叉的可能：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	(94)
第一节 译介学的学科渊源	(95)
第二节 译介学研究的性质与目的	(100)

第三节 译介学的研究内容	(103)
第七章 传统的反拨：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113)
第一节 翻译：即跨越边界	(114)
第二节 翻译：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	(117)
第三节 翻译：双重文本的产生	(122)
第四节 问题与反思：一个开放性的结语	(125)
第八章 时空的跨越：译经文学范式与近代英诗汉译	(130)
第一节 译经文学与韵体翻译传统说略	(131)
第二节 以文言为目标语的早期译诗	(141)
第三节 过渡时期的白话体译诗	(152)
第九章 他者的反观：意识形态批评与诗歌翻译研究	(162)
第一节 早期译诗活动中的赞助者	(164)
第二节 文化历史语境与早期选材问题	(173)
第三节 “文以载道”与翻译策略的择取	(184)
第十章 两难的选择：胡适的译诗与创作新解	(195)
第一节 胡适的译诗活动说略	(196)
第二节 胡适早期的文言体译诗	(198)
第三节 胡适的白话体译诗尝试	(204)
第四节 胡适的译诗与创作	(216)
第十一章 规范的重建：英诗汉译中新格律体实验考察	(222)
第一节 西诗之“步”与汉诗之“顿”	(223)
第二节 从“音缀”、“音组”到“以顿代步”	(225)
第三节 新格律体译诗理念的成熟与定型	(232)
第十二章 意象的把玩：朱湘译诗美学层面新论	(242)
第一节 “桃梨之争”的缘起	(243)
第二节 文学争论背后的理据	(245)
第三节 文学争论的诗学品味	(251)
第十三章 文本的游戏：译诗可学亦可教	(256)
第一节 基本理念回顾	(257)
第二节 游戏规则说略	(260)
第三节 文本间的舞蹈	(261)
第四节 游戏后的反思	(272)

第十四章 未来的憧憬：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研究	(274)
第一节 网络时代的翻译观与网络翻译文学	(275)
第二节 网络翻译对文学翻译批评理念的挑战	(281)
第三节 文学翻译的网络化与翻译软件的开发	(285)
第四节 网络翻译文学的意义与前景	(289)
后 记	(293)



学科的反思：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①

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逐渐踏上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化观念又肇源于思想领域。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研究方法如何与西方接轨的问题。20 世纪西方学术界理论研究之风空前盛行，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思考，这点在文学研究领域亦如此。本章试图结合上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根据真理与方法二元间的张力关系，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为切入点，讨论过去数十年来国内比较文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并从学理层进行一系列的反思。

第一节

“比较文学危机论”及其反思

关于中国比较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是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实现建制而全面展开的。近年来，国内外相关书籍和

^①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题为“关于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此处有修改。